

## 晚清貴州教區教務長童文獻考\*

郭麗娜 鄭 瑩

---

**[摘要]** 童文獻是晚清著名的法國入華傳教士，也是19世紀法國傑出的漢學家、博物學家和思想家。他在1853—1860年間擔任貴州教區教務長，採取若干具有明顯入世傾向的新措施來發展天主教會，穩固了新生貴州教會的根基。此外，他利用在華宣教之便向歐洲提供了大量中國物種，返回法國後倡議在漢口成立歐洲科學院，並積極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提出“中國優越於法國”的觀點。考察童文獻的文化活動，可知19世紀下半葉的中法文化關係是相當複雜的。

**[關鍵詞]** 童文獻 貴州 天主教 “中國優越於法國”

---

童文獻是巴黎外方傳教會(Société de la Mission Etrangère à Paris)在中國西南的傳教士，法文名為保祿·於貝爾·佩爾尼(Paul-Hubert Perny, 1818—1907)，出生於法國杜省(Doubs)蓬塔列市(Pontarlier)，畢業於貝藏松大神學院(Grand Séminaire de Besançon)，1843年4月15日晉鐸，擔任蓬塔列市聖母教區副本堂神父，1846年11月11日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1847年7月5日赴貴州傳教，主要在興義府、遵義、綏陽、湄潭和石阡等地活動。

1853年4月22日，貴州教區主教白斯德望(E. Albrand)去世，他生前指定貴州神修院院長胡縛理(L. Faurie, 1824—1871)為新主教，但胡縛理認為自己資歷尚淺，未敢接受任命。在這種情況下，先於胡縛理入黔的童文獻以教務長的身份對貴州教區行使實際管理權，直至1860年胡縛理被羅馬任命為貴州主教為止。<sup>①</sup>

童文獻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其一生頗為傳奇。他主理貴州教務期間，採取了若干新措施發展教會，但也因新措施與巴黎外方傳教會主張的傳教方式相左而遭到該會傳教士的抵制，於是，他於1872年脫離巴黎外方傳教會，以天主教會教士的身份繼續活躍在法國思想界，協助歐洲著名思想家、《基督教哲學年鑑》(*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主編伯納提(A. Bonnetti，

---

**作者簡介：**郭麗娜，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鄭瑩，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後。廣州 510275

\* 本文為廣東省社科基金項目“19世紀法國思想界的中國形象”(批准號：GD14CWW01)的資助研究項目。

① “Paul-Hubert Perny,” Archives de la MEPASIE, No. 532.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perny>.

1798 — 1879) 對耶穌會馬若瑟 (P. Prémare) 的遺作進行整理、翻譯和注解，編輯成《摘自中國典籍的主要基督教理遺芳》(*Vestiges des Principaux Dogmes Chrétiens Tiré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一書並於1878年出版。1880年，童文獻自創《天主教哲學新年鑑》(*Nouvelles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atholique*)，<sup>①</sup>1884年出版《殉道者之所》(*La Salle des Martyrs*)，介紹貴州教徒郝開枝等人的事跡。此外，童文獻是法國馴化協會成員、博物學家，熱衷於中國語言和文化研究，曾化名萊昂·貝爾當 (L. Bertin)，抨擊法國經院漢學大權威德理文 (H. de Saint-Denys) 曲解中國典籍，因而“聲名狼藉，在1874年9月30日被凡爾賽教化法庭處以500法郎罰金，入獄6個月，上訴後減為2個月”，<sup>②</sup>從而遭到法國漢學界的孤立，至2005年西方漢學雜誌《東方和西方》(*East and West*) 才承認他是“一個被遺忘的東方學家”。<sup>③</sup>童文獻曾在巴黎公社期間被國民軍扣押，作為人質的他歷劫生死，後出版回憶錄，譴責巴黎公社的暴行。1906年，即法國通過《政教分離法》(*La loi Concernant la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État*) 的次年，他署名“童文獻”在《天主教世界雜誌》(*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上連載長文《中國優越於法國》，以一名中國人的身份表達他對法國社會道德缺失和文化撕裂的憂慮。

童文獻作為法國人、傳教士和漢學家，其內心的複雜和糾結與19世紀下半葉錯綜複雜的法國社會狀況和雲譎波詭的中法關係不無相關。對他的主要活動和思想狀況進行研究，既可以深化對中國天主教會史特別是貴州教會史的研究，揭示某些以前被一筆帶過的史實，也可以加深對近代中法關係嬗變的理解。鑑於國內目前尚未有專文涉及此重要人物，本文將根據南志桓 (Adrien Launay) 的《貴州傳教史》、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相關文獻、法國各種協會的期刊和童文獻的著作，追蹤童文獻的行蹤，解讀其觀點，並討論其影響。

## 一、貴州教區的新傳教舉措

1846年3月8日，貴州脫離四川教區，成為宗教代牧區，川東主教范若瑟 (E. Desflèches) 被教宗庇護九世 (Pie IX) 任命為貴州代牧主教。<sup>④</sup>但是川東教務繁重，范若瑟無法兩頭兼顧，遂向羅馬推薦白斯德望。<sup>⑤</sup>白主教是一位相對保守的傳教士，堅持用傳統的“口對耳福音” (apostolat de bouche à oreille) 方式傳教。<sup>⑥</sup>他出任貴州主教期間 (1849 — 1853)，適逢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兩廣教權問題上與澳葡方面發生衝突，<sup>⑦</sup>由於法國天主教會在華南和西南的利益是

① Gustave Vaperea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Contemporains*, Paris: Lahure, 1893, p. 1234.

② Henri Cordier, E. Chavannes, “Paul Perny 童 Tong,” *T'oung-Pao*, S. II, Vol. 8, No. 1 (1907), pp. 125 — 127.

③ Lionello Lanciotti, “A Forgotten Orientalist,” *East and West*, Vol. 55, No. 1/4 (Dec 2005), pp. 467 — 471.

④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y-Tcheou*, T. 1, Pari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and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pp. 172 — 175.

⑤ “Etienne Albrand,” Archives de la MEPASIE, No. 398.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necrologiques/albrand-1805-1853>.

⑥ Claude Soetens, *L'Église Catholiqu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auchesne, 1997, p. 40.

⑦ 陳靜：《〈黃埔條約〉簽訂後法國教會在粵活動研究 (1844 — 1885)》，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第12 — 24頁。

爲一體，所以白主教不得不將部分精力放在支持本會與澳葡的抗爭工作上，促成香港主教會議的成立，<sup>①</sup>這也多少影響到了貴州本地教務的發展。

1853年，童文獻以教務長身份接手貴州教務之後，立即提出一系列發展教會的計劃，涉及傳教、教育和醫學。他準備“籌辦一所他稱爲師範學校的大型機構，內設三個主要教學部門……向我們認爲有能力履行職責的新教徒灌輸信仰，規範生活和進行宗教辯論。有人將來專事佈道，有人專攻有利於聖嬰事業的醫學，第三類人是要教育年輕一代”。<sup>②</sup>童文獻還鼓勵基督徒學童學習漢語，他在呈總會的報告中解釋道：“爲了讓我們的貴州學生能夠精通他們自己的語言，我聘請了一位中國文人爲他們授課……那些天資聰慧的孩子更要學習這一語言，如有可能，要考取功名，您難道不覺得這更有利可圖嗎？將來會有一大批有文化和信仰堅定的神父爲傳教事業做出貢獻。”<sup>③</sup>1856年，童文獻將神修院遷至貴陽六冲關，爲貴州修生楊通緒等人晉鐸，並制定出華籍神父的日規、月規和年規，同時規範傳道員的每日義務和巡視義務，<sup>④</sup>保證整個傳教體系在精神上的虔誠和信仰上的堅定。此外，童文獻還創辦《傳教報》(*Journal de la Mission*)和開設圖書室。他向總會解釋道：“新生教會的歷史應該如實傳於後人。”<sup>⑤</sup>《傳教報》除了記錄貴州教區的主要傳教事件之外，還有相當長的篇幅保留給“科學材料，包括歷史、地理、奇聞、當地的自然科學、該省的風俗習慣”。<sup>⑥</sup>這份報紙在貴州教區堅持創辦了12年，成爲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學家南志桓撰寫《貴州傳教史》的重要文獻之一。1857年，童文獻返回歐洲，遊說巴黎總會和羅馬傳信部，爲開展相關計劃籌集資金和招募人員。

不可否認，童文獻是一名相當有抱負的年輕傳教士。他的新舉措在當時未必能夠一一實現，但還是極大地推動了貴州教務的發展，鞏固了新教區的根基。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其生平略傳中肯定“他注重培養教徒，特別是醫學方面的培養工作，1855年在貴陽開辦了一個新診所，在大定也開辦了一處，兩年後在廣順也開了診所，1857年在貴陽開辦男童和女童救助所各一處”。<sup>⑦</sup>南志桓在《貴州傳教史》中對童文獻主持貴州教務期間貴陽孤兒院的成績也給予高度評價，指“這一做法的效果立竿見影，從異教徒兒童的受洗人數上可以看出來。1854年的數字比1852年增加了4,000人”，此後基本上逐年增加，1855年總人數達到15,424人，1856年26,012人，1857年20,085人，1858年30,553人，1859年29,767人。<sup>⑧</sup>

① “Etienne Albrand,” Archives de la MEPASIE, No. 398.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necrologiques/albrand-1805-1853>.

②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y-Tcheou*, T. 1, Pari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and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p. 372.

③ Ibid., p. 413.

④ Ibid., p. 416 – 428.

⑤ Ibid., p. 451.

⑥ Ibid., p. 452.

⑦ “Paul-Hubert Perny,” Archives de la MEPASIE, No. 532.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perny>

⑧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y-Tcheou*, T. 1, Pari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and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p. 450.

從上述新舉措中，我們也不難看出童文獻的傳教理念相對開明，具有明顯的入世傾向，與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原教旨主義和“內斂式”傳教模式格格不入。<sup>①</sup>首先，教會創辦學校是新教的做法，天主教其實並不提倡，直至20世紀初，天主教會內部仍有不少人“認為辦學的努力不利於真正福音的傳播”。<sup>②</sup>其次，巴黎外方傳教會早在“中國禮儀之爭”時譴責過拜孔祭祖，不鼓勵天主教徒考取功名和參與習俗活動。因此貴州其他傳教士如梅西滿（S. Mihière）、李昂（F. E. Lions）和胡縛理等人原先均支持童文獻出任教務長，後來都改變態度，持保留意見。到了20世紀初，南志桓在編寫《貴州傳教史》時，仍明確表示“我們不能贊同佩爾尼的意見（指鼓勵學童參加科考）”。<sup>③</sup>

1860年，胡縛理出任貴州主教，他致函總會，稱“儘管佩爾尼先生在未徵得本會兄弟同意的情況下採取了一些行動，但我們不會撤銷其所為，因為最明智和最溫和的做法是不要否定既成事實的行為，而只是知會本會長上：鑑於內外部的戰爭，時機尚未成熟”。<sup>④</sup>不過胡縛理在隨後的工作中還是慢慢地淡化童文獻的影響，比如刪去《傳教報》中科學研究部分的內容，僅保留宗教部分。<sup>⑤</sup>1861年，童文獻向兩廣教區主教明稽章（Ph. Guillemin）申請到廣西傳教。當時兩廣教務急速擴張，明稽章手頭十分缺人，但“梅西滿到廣州旅行時，就廣西教務和明稽章做了長談”，<sup>⑥</sup>此後明稽章拒絕童文獻的請求，捨近求遠，要求巴黎總會派遣新傳教士到廣西工作。1862年，童文獻離開貴州到川東，不久返回法國，專心從事漢語專著的編寫。1872年，童文獻脫離巴黎外方傳教會，以天主教修道院院長（l'abbé）的身份繼續參與法國國內思想界的活動。<sup>⑦</sup>

## 二、引進中國物種、倡議在漢口成立歐洲科學院

童文獻在貴州傳教時，正值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工業革命興起，各種地理勘探和動植物馴

① 郭麗娜：《清代中葉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川活動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

② Claude Soetens, *L'Eglise Catholiqu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auchesne, 1997, p. 61.

③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y-Tcheou*, T. 1, Pari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and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p. 413.

④ Ibid., p. 471.

⑤ Ibid., p. 531.

⑥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ang-Si*, Paris: Librairie Victor Lecoffre, 1903, p. 102.

⑦ 南志桓在《貴州傳教史》（第一卷第531頁）中交代了童文獻的部分後續文化活動，提及他在注解馬若瑟的作品時使用了西奧奈神父（A. Sionnet）這一筆名。西奧奈神父確有其人，是著名的法國耶穌會士，生卒日期未詳，主要活躍於19世紀上半葉，因在1845年出版《論本堂神父及其在教會中的權利》（*Des Curés et de Leurs Droits Dans L'Église*）一書而著名，也曾在1839年注解過馬若瑟的文本。而童文獻的注解版本出版於1878年，出版時使用的是自己的本名。另外，筆者查閱了19世紀法國的主要宗教期刊，如《宗教和國王之友》（*L'Ami de la Religion et du Roi*）、《宗教、歷史和文學研究》（*Études Religieus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和《基督、基督主義和未來的宗教》（*Le Christ, le Christianisme et la Religion de l'Avenir*）等，都沒有找到西奧奈神父在19世紀下半葉的活動信息；再者，巴黎外方傳教會亞洲教會網上檔案資料、瓦貝魯（Gustave Vapereau）主編的《世界當代名人辭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Contemporains*）的“佩爾尼”條和1907年考狄在《通報》上為童文獻撰寫的訃告中都沒有“童文獻使用西奧奈筆名”一說，由此筆者推斷南志桓的說法有誤。

化協會紛紛成立，涉洋尋找原材料和推銷商品。法國外交人員和傳教士遠赴海外，有機會進行實地考察，因此成爲各協會招攬的成員。童文獻、明稽章和胡縛理等人都是法國馴化協會成員，但是明稽章和胡縛理更加關注傳教利益，明稽章在籌建廣州石室教堂時對拿破侖三世說：“廣東沒有法國的貿易，法國在那只以天主教士而出名。”<sup>①</sup>相反，童文獻驚嘆於中華帝國的地大物博，熱衷於動植物研究和標本搜集，主張系統地研究中國的物產、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農工商業。

據《里爾地理學會會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ille*)記載，童文獻先後向法國各動植物培育協會寄回8,000多種中國物種，<sup>②</sup>並試圖引進到法國，改良歐洲物種。陸南也提及童文獻研究過廣西植物，“佩爾尼說龍眼是 *euphoria* (即龍眼的拉丁名)”。<sup>③</sup>此外，童文獻還向帝國動物馴化學會贈送過多種可食用植物、可染色植物以及多種動物蠟和昆蟲蠟，<sup>④</sup>委托過里昂皇家獸醫學校主任勒科克(Lecoq)帶回狂犬病藥物的樣品。<sup>⑤</sup>童文獻非常推崇中醫哲學和中藥療效，認爲中國的地理、氣候和種群的特性決定了中國不需要外科醫學，中醫瞭解植物的特性和療效，善於利用自然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來治病，其治療法比西醫更加高明。<sup>⑥</sup>這引起了西醫名家馬提農(Matignon)與著名外科醫生、里昂科學院院士歐仁·萬森(Eugène Vincent)的強烈不滿，後者認爲“中醫沒有希波拉底的醫學那般智慧和科學”，不滿“佩爾尼鼓吹中國的治療法和藥典”。<sup>⑦</sup>

在童文獻引入歐洲的中國物種中，柞蠶令他在生物學史上留名。柞蠶是以柞樹葉爲食料的吐絲結繭昆蟲，蠶絲產量大，屬鱗翅目大蠶蛾科，學名爲“*Antheraea pernyi* Guérin-Méneville”，其中“*pernyi*”正是童文獻的法文姓氏讀音，“Guérin-Méneville(蓋蘭-梅內維勒)”則是法國著名的蠶種馴化專家。

19世紀上半葉，法國里昂絲織業在歐洲已享有盛名，商會多次委托赴華傳教士和外交人員搜集中國養蠶業的資料。1849—1850年間，法國駐滬領事敏體尼(Louis Charles de Montigny)將一批蠶蛹從上海寄回法國農業部；在同一時期，童文獻也從貴州往里昂寄出500多顆蠶蛹。這兩批蠶蛹都在1851年寄達法國，但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大部分無法成活。1855年，敏體尼又將一批蠶蛹寄給法國國家馴化協會，<sup>⑧</sup>由動物學家蓋蘭-梅內維勒負責培育。1855年5月25日，蓋蘭-梅內維勒向法國國家馴化協會宣佈培育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協會會刊寫道：“蓋蘭-梅內維勒先生帶來了柞蠶的新消息。他建議將此品種命名爲‘佩爾尼蠶’，目前有四隻雄蟲破繭，

① Eudore de Colmban, *Le Premier Évêque de Canton*, Pékin: [sn], 1928, p. 87.

② Paris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ille*, T. 2 (1883), p. 184.

③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ang-Si*, Paris: Librairie Victor Lecoffre, 1903, introduction p. 6.

④ Société Impériale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mpériale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T. 5 (1858), p. 109.

⑤ Ibid., p. 292.

⑥ Tong Ouen-hian, “La Chine Supérieure à la France,” in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T. 11 (Juillet-Septembre 1906), p. 282.

⑦ Eugène Vincent, *La Médecin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Paris: G. Steinheil, 1915, p. 162.

⑧ Société Nationale d'Acclimatation de Fran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Acclimatation de France*, A. 2, N. 7 (Juillet 1855), p. 364.

他展示了其中兩隻。”<sup>①</sup>此後童文獻多次參與野生蠶的培育實驗，<sup>②</sup>並向帝國動物馴化協會贈送野生柞蠶繭。1858年7月18日，童文獻借返法闡述傳教理念之機，在動物馴化協會進行了關於“貴州柞蠶的專題報告”，詳細地介紹了貴州養蠶業的狀況。<sup>③</sup>

19世紀60年代，蠶微粒子病(pébrine)流行，幾乎摧毀了法國塞文山脈的養蠶業，童文獻引進的柞蠶成爲了拯救法國蠶絲業的希望之一。1861年4月4日，蓋蘭-梅內維勒正式向法蘭西帝國和中央農業協會提議將新蠶種命名爲“Bombyx Pernyi(即佩爾尼蛾)”，“以紀念虔誠和真摯的佩爾尼閣下，中國中部貴州省的傳教士，是他第一個寄來活蠶繭”。<sup>④</sup>由於“柞蠶卵的孵化需15—20天，冬天化爲蠶蛹”，難以適應冬天相對寒冷和漫長的歐洲氣候，所以整個馴化過程十分艱難。<sup>⑤</sup>到了70年代，歐洲才普遍養殖柞蠶，並進行中日蠶種雜交試驗。<sup>⑥</sup>爲了鼓勵優良蠶種的培育，法國國家自然保護協會還設立獎項，“將於1880年獎勵佩爾尼蠶的最佳培育者一枚價值1,000法郎的獎章”。<sup>⑦</sup>不過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中國絲綢產品逐步進入法國市場，造成競爭，不少法國絲織廠紛紛倒閉，養蠶人逐漸消失，而人造絲出現之後，法國的繭絲綢業就一蹶不振。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之後，童文獻以前貴州教務代理人的身份向法國科學界倡議在漢口成立歐洲科學院。他在寫給動物馴化學會主席德·劉易斯(Drouyn de Lhuys)的信函中說“中國是自然物產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需要“在中國內地成立一個永久性機構”，<sup>⑧</sup>來“從方方面面地瞭解中國，推動這一龐大帝國的奇異和有用產品的出口”。<sup>⑨</sup>他提出詳細規劃，準備聘請3—4名在中國生活超過20年的法國傳教士、3—4名中國博士或翰林、3—4名中國藥劑師、3名有經驗的中國醫生、2—3名歐洲博物學家和2名歐洲繪圖員。具體分工是：傳教士主持科學院的工作；中國博士負責搜集百科全書和釋義；藥劑師負責鑑別草藥，赴各地搜集標本；醫生提供草藥的資料、藥性和功效等信息；歐洲博物學家對草藥進行科學分類，並管理科學院的博物館和圖書館；繪圖員爲刊物製圖。科學院將和各省法國傳教士保持密切聯繫，每月出版一期刊物，按以下20個門類輪流刊登成果：植物、動物、礦物、歷史、哲學、宗教、法律、經濟、語言文學、地理、醫學、農業、技藝、錢幣、藝術、軍事技術、商業、名人傳記、中國或歐中書目，以

① Société Nationale d'Acclimatation de Fran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Acclimatation de France*, A. 2, N. 7 (Juillet 1855), p. 389.

② Société Impériale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mpériale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A. 2, N. 7 (Juillet 1855), p. 198.

③ Société Impériale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mpériale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A. 2, N. 7 (Juillet 1855), pp. 314—319.

④ Société Impériale et Centrale d'Agriculture, *Bulletin des Séances de la Société Impériale et Centrale d'Agriculture*, S. 2, T. 16 (1861), p. 233.

⑤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Revue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de la France et de l'Etranger*, Paris, S. 3, T. 3 (1860), p. 635.

⑥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S. 3, T. 1 (1874), p. CIII, 298—299.

⑦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S. 3, T. 1 (1874), p. XXX.

⑧ Ibid., pp. 726—727.

⑨ Paul-Hubert Perny, *Projet d'une Académie Européenne au Sein de la Chine*, Paris: Jules Boyer, 1874, p. 6.

及土人或苗子的研究。出版物將免費贈予贊助人，其餘的作銷售盈利以維持科學院的正常運作。科學院擬選址漢口，因為漢口“在最近的條約中向歐洲人開放……位於長江上，正處於中國的中心”，<sup>①</sup>交通發達，法租界已在1869年劃定，非常便於各方溝通，促進科學研究的開展。

童文獻的計劃不乏前瞻性，但是法國當時尚未走出色當戰敗的陰影，巨額的戰爭賠款令保守派政府大為頭痛，根本沒有財力支持計劃的實施。各學術機構無法評估風險，馴化學會表示“已提交委員會討論”後，<sup>②</sup>便沒有下文；其他學會也婉言謝絕。即便如此，童文獻仍不餘遺力，四處推銷研究中國文化的理念。1882年12月14日，他身着中國傳統長褂，到法國北部最大工業城市里爾的地理協會宣講，推介《西語譯漢入門》(*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和《西漢同文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介紹中國的基本國情、儒家學說、政治制度、各種技藝和動植物學，重申要尊重中國文化的觀點。他在演講中說：“我們經常以最不公道的把中國人說成落後民族，絲毫沒有想到他們比我們提早20個世紀擁有這一切。”<sup>③</sup>

### 三、編撰漢語專著和提出“中國優越於法國”的觀點

19世紀下半葉，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思潮喧囂，不少西方學者鼓吹語言決定論，認為中國人使用孤立語，是原始落後的種族。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語文學家勒南(E. Renan)曾斷言“漢語無語法結構，無組織形式，不正反映出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思想貧瘠嗎？漢語只足以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手工技術生產的需要、一種輕浮低級和不上檔次的文學的需要，所以漢語排除一切哲學、科學和宗教”。<sup>④</sup>神學家吉里(A. Gilly)稱“漢語的句子缺乏統一性，沒有章法，不足以形成話語，無法反映深邃和細膩的思想”。<sup>⑤</sup>法國東方學界也普遍把漢語神秘化和低級化。里昂學院的希伯來語教授吉諾(Guinaud)認為“漢語的構詞方式有限，這種語言極端貧瘠。秦人的後裔只有450個語言音節……這種幼稚的語言只具有言語的初始形態，用來表達成人的豐富思想時，注定了人們必須進行艱苦的智力操練”。<sup>⑥</sup>

對此，童文獻十分反感。他指出“由於這些偏見的存在，直至雷慕沙時代，‘中國語言’仍是‘無法解開的秘密’的同義詞，也和‘中國人’一起作為‘可笑’的代名詞。現在這一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根深蒂固”。<sup>⑦</sup>他認為孤立語一點也不遜色於屈折語，漢語偏旁具有意義，造字法簡單合理，“通過偏旁就能組成新字，根本不需要向其他語言借詞”，即使象形文字轉化成

① *ibid.*, p. 7.

②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S. 3, T. 1 (1874), p. 784.

③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il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ille*, T. 2 (1883), pp. 181–185.

④ Ernest Renan, *De l'Origine du Langag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 1859, p. 195.

⑤ Alfred Jean Gilly, *La Science du Langage*, Paris: Charles Douniol, 1865, pp. 269–270.

⑥ Guinaud, *Origine de l'Alphabet*, in Paul-Hubert Perny,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Paris: Maisonneuve, 1873, p. 12.

⑦ Paul-Hubert Perny,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Paris: Maisonneuve, 1873, p. 7.

拼音文字，也不會損害漢語的統一性。漢語“最完美的統一體現在造字上，字可以被讀懂，但無需知道它的音和調”，從欣賞的角度來看，歐洲語言是通過耳朵來識別的，而漢語是通過眼睛來品味的，<sup>①</sup>更加回味無窮。童文獻認為，要促進法中相互瞭解，必須先向法國人講解漢語的機制，讓法國人明白“中國語言和任何語言一樣簡單易學”。<sup>②</sup>他從中國帶回大批文獻，和法國經院漢學家保提愛(G. Pauthier)保持頻繁的學術往來，<sup>③</sup>並從保提愛處得到法國耶穌會士湯執中(Pierre d'Incarville, 1706 – 1757)的漢語詞典手稿，在巴黎博物館負責人的協助下對中國文獻進行梳理。1869–1876年間，童文獻用在華傳教時向美國長老會購買的漢字模具，<sup>④</sup>先後在巴黎出版了四套漢語專著，分別是：《西語譯漢入門(及附錄)》(*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et Appendice*，正文部分在1869年出版；附錄在1872年出版)；《中國俗語》(*Proverbes Chinois*，1869)；《拉漢對話錄》(*Dialogues Chinois-Latins*，1872)；《西漢同文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口語部分於1873年出版，書面語部分於1876年出版)。

在這些專著中，影響最大的是《西語譯漢入門》和《西漢同文法》。這兩套書自成體系，又渾然一體，其出版目的是要促進法中相互瞭解，展望法國“和天朝的商貿發展迅速，尤其是帝國郵船公司的火輪班次正常化之後，我們將有更多的國民來到中國，加入貿易大潮”。<sup>⑤</sup>因此與同一時期巴黎外方傳教會和法國經院漢學家所編寫的漢語詞典和教材相比，<sup>⑥</sup>這兩套書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已遠遠超出了漢語教材的範疇，實際上是一套關於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百科叢書；其二，兩套書都以普及中國的共同語為己任，排除方言的因素；其三，兩套書都採用耶穌會的漢語拼音方案，並對個別注音作出適合法國人拼寫習慣的修改，以方便法國人學習。從西方漢學發展史來看，早期西方漢學家受馬禮遜的影響，在漢語教材和詞典的編寫中表現出明顯的“重文輕語”傾向，<sup>⑦</sup>不重視口語學習。相反，童文獻的漢語專著在向法國經院漢學家和耶穌會士靠攏的同時，進行了適合法語正字法的變通，有利於法國人學習和領會漢語口語，因此，《西語譯漢入門》和《西漢同文法》的編寫可以說是法國漢語教學首次從重“文”向重“語”的轉變。<sup>⑧</sup>

① Tong Ouên-hièn, “La Chine Supérieure à la France,” in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T. 11 (Juillet-Septembre 1906), pp. 237 – 238.

② Paul-Hubert Perny,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Paris: Maisonneuve, 1873, p. 8.

③ 保提愛當時正在對小德經的《漢字西譯》(*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1813年出版，西方漢學界認為該詞典是小德經抄襲自葉尊孝的)進行增補，在1867年出版了《增補漢字西譯》(*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Chinois-annamite Latin-français*)。

④ “Paul-Hubert Perny,” Archives de la MEPASIE, No. 532.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perny>.

⑤ Paul-Hubert Perny, *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et Appendic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ères, 1869, pp. 5 – 6.

⑥ 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傳教期間，編寫了大量中國方言詞典和教材。參見郭麗娜：《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中國學研究及其影響》，《汕頭大學學報》(汕頭)2010年第3期。

⑦ 楊慧玲：《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馬禮遜、衛三畏、翟理斯漢英詞典的譜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03頁。

⑧ 郭麗娜：《童文獻的漢語研究》，蒲志鴻等主編：《中法關係與交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84–194頁。



在童文獻編撰漢語書籍期間，法國巴黎公社起義爆發。童文獻因外出未隨身攜帶護照而被國民軍拘捕，被錯當成“和凡爾賽勾結的”耶穌會士而先後被囚禁於臭名昭著的瑪匝斯監獄（Mazas）和拉羅凱特監獄（La Roquette），期間多番申訴無果，並目睹大量未經審判的秘密槍決和非法折磨，後來在大屠殺中僥幸逃生。兩個月的非人道經歷使童文獻開始質疑以理性主義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並進一步對東方文明表現出好感。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們的國家，恰恰相反，野蠻行為竟然如此精心策劃，執行方式登峰造極。我們從中感受到了一種極端先進的文明，它脫離正軌，正大踏步回歸野蠻。”<sup>①</sup>回顧在華傳教的經歷，雖然充滿曲折，卻未曾遭遇牢獄之災，沒想到“這一人生空白竟然要在第四次遠涉重洋返回自稱文明搖籃、普世道德引路人的人們中間得到填補”。<sup>②</sup>他抨擊巴黎公社的激進行為，指“‘破壞、摧毀、打砸、撕裂、搶掠、沒收、恐怖、堵住人民的嘴、消滅、抹去、製造禽獸般的仇恨、瘋狂的懷疑、隨意的逮捕、頒佈缺乏理智的政令、發動隨意的屠殺，如此等等。’正是巴黎公社的慣用語彙”。<sup>③</sup>他也批評某些西方人嘩眾取寵，歪曲東方文明，“這些書籍不僅在法國的普通民眾中，而且在上層社會，包括學術機構和學者團體中形成了一種關於中國人的錯誤看法”，<sup>④</sup>其實“歐洲人的生活充滿了無數人為的需要。從這一角度看，亞洲人比歐洲人更加幸福”。<sup>⑤</sup>童文獻認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續，是受個人主義影響而社會分化的法國所不能比擬的，中國並非絕大多數入華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所說的“迷信、落後”，而是秩序混亂和文化撕裂的近代法國社會的對蹠點，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研究，應該可以尋找到糾正近代法國社會弊病的良方。因此，在後期出版的著作中，童文獻一再強調：“這些古老人群的文明程度一點不比我們低，儘管他們不懂得使用屈折語……中國遠古時期的編年史雖然相當含糊，但是不論大家持何種觀點，漢語毫無疑問是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口頭語言之一……”<sup>⑥</sup>“人們用這種語言寫下內容豐富和資料翔實的百科全書。這至今無一民族能夠超越的……藝術、科學、文學在中國繁榮了五千多年。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帝國都走在我們的前面。這是不容辯駁的事實……”<sup>⑦</sup>所以法國人需“先學好語言，再做評論”。<sup>⑧</sup>

1905年，法國激進派政府通過《政教分離法》，徹底完成政權世俗化的過程。1906年2月11日，羅馬教宗發佈通諭予以譴責，<sup>⑨</sup>法國國內出現了新一輪社會衝突。童文獻憂慮《政教分離法》使法國社會再度分裂，自4月1日起在《天主教世界雜誌》上連載《中國優越於法國》，<sup>⑩</sup>充分肯定中國文明的優越性，試圖通過提出尊重文化多元來呼籲法國社會團結。《中國優越於法國》一文共28章，提出28條理由，指出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都優越於法國。這些理由

① Paul-Hubert Perny, *Deux Mois de Prison Sous la Commune*, Paris: Aldophe Lainé, 1871, p. 6.

② Ibid., p. 25.

③ Ibid., p. 58.

④ Ibid., p. 60.

⑤ Ibid., p. 65.

⑥ Paul-Hubert Perny,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Paris: Maisonneuve, 1873, p. 5.

⑦ Paul-Hubert Perny, *Projet D'une Académie Européenne au Sein de la Chine*, Paris: Jules Boyer, 1874, pp. 3 – 4.

⑧ Paul-Hubert Perny,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Paris: Maisonneuve, 1873, p. 14.

⑨ Dominique Barjot, Jean-Pierre Chaline, André Encrevé,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PUF, 2011, p. 240.

⑩《中國優越於法國》可能已於1905年在巴黎阿瑟·薩瓦埃特出版社（Arthur Savaète）出版。

分別是：中國比法國更古老；國土更遼闊；人口更多；政治更清明；文明更悠久；君主制的歷史更古老；政府架構更簡單；政治和社會體制更穩定；公民更自由；風俗和文明具有歷史延續性和一致性；中國比法國更早立法，律法有連續性和一致性；更早提出和實踐社會經濟理論；文明更加平和；注重道德和哲學教育；敬重祖先；婚姻制度健康，宗法制度健全；漢語比法語更古老和統一，更通用，更豐富；教育自由；更早成立公共救助機構，而且數量更多；中醫學研究和治療法比西醫更古老；國民教育到位，社會風氣良好，中國人彬彬有禮；文化、科學和藝術更加古老，博大精深；自由藝術發達；天文學的歷史悠久；農業成熟、園藝業精緻、養魚業發達；尊重權威，社會有序；優先發展實用性的藝術、職業和工業；最後是礦產豐富。<sup>①</sup>童文獻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具有許多先天的自然優勢，經濟理論先進，主張重農主義，政治制度以儒家學說和德治主義為基礎，倫理思想體現出融法律與道德為一體的特色，彰顯人性。即使是備受詬病的家族宗法制度，也有其正面的政治意義，有助於簡化政府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因為“中國家庭在政府行爲之外自治”，人口逐漸增加，而社會秩序井然，“儘管中國實踐純粹的君主制，但她比法國和其他徒有‘共和’虛名的國家都要民主得多”。<sup>②</sup>在文章的最後，童文獻仍不忘用大量的篇幅來羅列中國的奇珍異產，從動植物到礦產資源，種類繁多，再次展望從經濟貿易角度來發展法中關係。

從法國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來看，童文獻此舉似有借肯定中國君主政體的社會成效來否定法國民主政治和主張教權主義的嫌疑。但實際上，法國天主教會自治論（gallicanisme）肇始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法國政府將大量天主教產充公，導致法國和羅馬的關係緊張。1801年7月，拿破崙和羅馬簽訂《教務專約》，雙方達成諒解。《教務專約》的三大基本原則是：加大國家對主教（évêque）的控制；擴大主教對本堂神父（curé）的權力；國家試圖對法國主教行使與教宗對於主教一樣的控制權。根據這些原則，主教由羅馬提名，國家任命；本堂神父由主教任命，但需徵得國家同意。<sup>③</sup>從表面上來看，法國政府和羅馬之間因此形成了相互制約關係，但實際上由於法國政府是直接的管理者，所以羅馬對法國天主教會的控制力是遭到削弱的，這為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做好了準備。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在法國國家世俗化的過程中，一般主教因代表羅馬而反對世俗化，而本堂神父卻因代表法國天主教會的利益而主張自治，因此，法國天主教會自治論在當時已成爲主流，並在普通天主教士團體中形成共識。法國史學家安科維（A. Encrevé）指出：“19世紀末法國政府決定讓學校世俗化，然後政教分離，儘管兩者都受到教宗和主教們的嚴厲譴責。但這些創舉仍然得到一個絕大多數自認爲是天主教徒的選舉群體的支持。”<sup>④</sup>童文獻並非主教，而是普通天主教徒，因此《中國優越於法國》與其說是一篇維護教權

① 參見 Tong Ouên-hiën, “La Chine Supérieure à la France,” in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T. 10 (Avril-Juin 1906), pp. 478–639, 755–765; Tong Ouên-hiën, “La Chine Supérieure à la France,” in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T. 11 (Juillet-Septembre 1906), pp. 56–71, 234–245, 269–294, 447–468, 574–593, 701–706; Tong Ouên-hiën, “La Chine Supérieure à la France,” in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T. 12, N. 1 (Octobre 1906), pp. 207–221.

② Tong Ouên-hiën, “La Chine Supérieure à la France,” in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T. 10 (Avril-Juin 1906), pp. 631–633.

③ Dominique Barjot, Jean-Pierre Chaline, André Encrevé,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PUF, 2011, pp. 235–294.

④ Dominique Barjot, Jean-Pierre Chaline, André Encrevé,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PUF, 2011, pp. 246–247.

主義的檄文，倒不如說是童文獻終其一生思考東西方文明關係的最後總結。文章發表次年，童文獻辭世。

## 結語

綜上所述，童文獻不能被簡單地定義為一個為西方帝國主義開路的傳教士。他的一生經歷了法國社會動蕩、思潮湧現的時期，以及現代國際關係正在形成的複雜階段。19世紀的法國處於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陣痛之中，大革命以摧枯拉朽的方式終結了封建舊制度，但啓蒙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卻無法一蹴而就，“大革命摧毀了舊的社會秩序，讓個人相互分開，但同時也使社會陷入了支離破碎的泥坑”。<sup>①</sup>在社會世俗化的過程中，法國人經歷了一個社會分化、文化撕裂和價值觀重塑的漫長時期。在此背景下，童文獻是複雜和多面的。

首先，作為貴州教區教務長，童文獻強調教育和醫學對於傳教的作用，這是一種對巴黎外方傳教會入華以來中國天主教呈現出明顯“鄉村面貌”的改變的嘗試，<sup>②</sup>並取得一定成效。胡縛理出任貴州主教之後，雖然童文獻的影響被不斷淡化，但其新傳教主張仍是20世紀天主教會在華宣教方式轉變的先聲。其次，作為漢學家，童文獻不同於閉門造車的法國經院學者，他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與達伯理(Dabry)等法國駐華外交官關係密切，理念相近，對中國文化有相對客觀的認識，且清醒地意識到理性主義的弊端，所以更加嚴肅和深刻地思考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和關係，主張文化多元，呼籲法國走下文明教化者的神壇，探索一種基於經濟貿易的雙邊關係。當然，作為法國人和天主教徒，童文獻在肯定中國文化的正面意義的同時，難免流露出其民族主義的一面。他說過：“對科學、宗教和祖國有利，是我的唯一希望。”<sup>③</sup>為此他積極引入中國物種，主張建立漢口歐洲科學院，並憂慮法國的前途。

總之，童文獻是19世紀法國傑出的漢學家和思想家。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窺見19世紀下半葉的中法文化關係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得多，其中仍有不少細節需進一步研究。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① [法]讓·皮埃爾·里烏(Jean-Pierre Rioux)等主編，安東尼·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等著：《法國文化史》卷三，朱靜、許光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78頁。

② Claude Soetens, *L'Eglise Catholiqu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auchesne, 1997, p. 39.

③ Paul-Hubert Perny, *Projet d'une Académie Européenne au Sein de la Chine*, Paris: Jules Boyer, 1874, p. 7.